

#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

纪秀明

**[摘要]**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演化经历了生态危机本源论、生态本质主义、性别正义等重要阶段,不断深化。以我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借鉴与检视为视角,考察国内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关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美学范式的差异,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整体性、关联性成为我国本土批评对西方生态本质主义的修正观点;第二,性别政治与社会政治的同构性,决定了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宏阔视野与批判性特质;第三,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没有满足于道家思想等传统理论的外用,而是时刻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辨与警醒;第四,相较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的窄化与偏颇,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社会化批判视野。生态女性主义丰富了我国文学叙事与美学阐释的空间与路径,提供了诸多叙事创作启示。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 中国经验; 理论检视; 叙事启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23]02-0069-09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3.02.013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分支,被称为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生态环境运动深度融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传入我国多年,“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以及中国当下文化语境和传统文化资源来看,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是必要且合理的”<sup>①</sup>。因此在借鉴与融合的总体趋势下,考察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式拓进,发起基于中国经验视角的理论检视,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

学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出自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娃·德奥波妮(Françoise d'Eaubonne)的《女性主义,或者死亡》(*Feminism or Death*, 1974)。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的《女性与男性是否等同于自然对文化?》(*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1974)、罗斯玛丽·雷福德·卢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的《新女性,新自然》(*New Woman, New Earth*, 1975)、安妮特·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的《地势:美国生活和文学中作为经验及历史的隐喻》(*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 1975)等,陆续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序幕。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女性与自然:女性心底的怒号》(*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1978)、玛丽·黛利(Mary Daly)的《妇科与生态学》(*Gyn/Ecology*, 1978)、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80)等作品都探讨了女性/男性、自然/文化之间的某种本质性倾轧关系,被认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支系众多,本处仅以本质主义观为导线,进行简要回溯。

### (一) 危机与生态本质主义

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经历了生态危机本源与生态本质主义两个阶段的思考。德奥波妮等将生态危机与毁灭的本源锁定为男性,而不是林恩·怀特(Lynn White)及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Naess)归咎的宗

**作者简介:** 纪秀明,女,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批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释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9BWW009)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吴琳:《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本土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教文化与人类中心主义。德奥波妮认为父权制度、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女性滋养万物,是拯救世界与星球的希望:“在女性手中的星球将会养育万物,生命充盈。”<sup>①</sup>由于女性与自然的亲缘性,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呈现出生态本质主义特征。这种本质主义一方面从肉体与精神双重层面肯定了女性与自然的镜像性;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赋予了女性与自然关系不变的预设性和超社会历史经验的永恒性,将对女性-自然-父权制度的关系认知固化于超验基础上。本质主义观让生态女性主义忽视了本体在时空、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自身演变下的能动性,从而以一种“本与质”认知上的二元思维,重蹈了“父权-女性”“父权-自然”的二元批判覆辙。

作为一个开放性理论体系,本质主义观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内部也不断丰富发展。珍妮特·比勒(Janet Biehl)的《探路:重审生态女性主义政治》(*Finding Our Way: Rethinking Ecofeminism Politics*, 1991)、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的《友善的女性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与民主追求》(*The Good-Natured Feminist: Ecofeminism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cy*, 1999)、罗斯玛丽·雷福德·卢瑟的《盖亚与上帝:医治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 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 Healing*, 1992)、斯泰西·阿莱(Stacy Aliaimo)与苏珊·赫克曼(Susan Hekman)编辑的《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s*, 2009)等,打破了女性/男性、自然/文化、肉体/灵魂、客体/主体及情感/理性等“现象与本质”二元认知局限,将社会学、神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观等多元学术观点引入论域。《物质女性主义》赋予身体地方性维度,由此勾连起物质身体与空间、话语之间的多维联系。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敏锐觉察到美国生活和文字中不断重复的土地是女性的符号象征,质疑批判将女性与自然画等号的行为:“就因对于美国边境地带未知领域危险的、异质的、软弱的恐惧,就把土地比喻为养育的、供给的女性的乳房,这是否必要?”<sup>②</sup>此外,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式的文化批判理性、诺埃尔·斯特金(Noel Sturgeon)的种族主义视野(将种族观念纳入种族女性、种族自然区域的关联细化)等,都深化和丰富了生态女性本质主义观。

## (二) 隐喻滥觞与普鲁姆德批判

本质主义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自然-性别”隐喻的日益泛滥。随着对生态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社会化视角的融入,生态女性主义逐渐从男性/女性本质主义式对峙之维进入文化反思与批判之维。

普鲁姆德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3)和《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2002)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化反思的代表性作品。普鲁姆德批判了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二元理性,认为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是所有二元论价值观的基础,这种二元价值观构成了各种形态的统治、殖民,包括性别、种族、阶级和自然压迫。她认为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一系列灾难来源于理性主义者或理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生态自然与女性危机的文化根源,理性、自由和“超自然”等被认为是凌驾于自然与女性之上的,理性主义甚至以强势的话语霸权界定了哪些构成自我及对人类而言是必要和有价值的。同时,她反对本质主义以自然、女性作类比,将女性劣等化的机械自然观。因为这是一种基于身体与自然属性的理论阴谋与暴力:“女性明显总是与作为理性对立面的低等自然秩序相联系,与无形杂乱的物质或原初的混沌相联系,与杂乱无章和无节制的情感、与闲言碎语、与道德之罪、与无知无能、与动物性和背离逻各斯、与低级的不适合公共领域的奴性、与低劣的自我和肉体的欲望等相联系。”<sup>③</sup>传统西方二元论倾向于把女性描述为亲近自然的感性存在,女性被夸大了感性与非文化的自然属性,而男性恰恰被放置于理性与文化代

<sup>①</sup>Françoise d'Eaubonne, "The Time for Ecofeminism," in Carolyn Merchant (ed.), *Ecology: Key Concepts in Critical The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4, p. 194.

<sup>②</sup>Annette Kolodny, *The Lay of the Land: Metaphor as Experience and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 9.

<sup>③</sup>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99. 译文转引自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0 页。

言人的一端,女性被隔离在文化的藩篱之外。因而她激烈批判,并提倡“不强迫女性无批判地参与充满男性偏见的、二元化的文化建构,或接受古老的、压迫性的大地母亲的身份——外在于文化并与其对立的未充分发展的人”<sup>①</sup>,而是要在“关系中的自我”塑造中,探索互惠自我的、与他者形成博弈平衡的文化图景。总之,普鲁姆德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她对父权制下的古希腊哲学、理性传统与二元价值观的犀利批判,以及对女性融合文化属性的热烈诉求。

### (三) 性别正义与环境公正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西方生态批评整体转向“环境正义”,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女性主义在经由本源论、本质主义与文化批判后,批评视角由性别正义向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性别公正/社会公正”成为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理论核心<sup>②</sup>,批评家纷纷从女性视角思考性别、自然与正义问题。

莉奥妮·考尔德科特(Léonie Caldecott)和斯蒂芬妮·利兰(Stephanic Leland)共同主编出版的《重拾地球:妇女为地球生灵大声疾呼》(*Reclaim the Earth: Woman Speak out for Life on Earth*, 1983) 收纳了以女性与生态为核心的诸多议题,着重分析妇女与自然所遭受的社会、政治、经济压迫,探索超出文化范畴的社会深层根源,尤其偏向行动主义与社会学。蕾切尔·斯坦的《环境公正新视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及行动主义》(*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2004)、诺埃尔·斯特金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种族、性别、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Ecofeminist Natures: Race, Gender,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Action*, 1997)、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生生不息:妇女、生态与发展》(*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1988)也是生态女性主义社会化转向与“公平正义”转向的重要代表作品。

相较于蕾切尔·斯坦选编论题的宽泛与开阔性,范达娜·席瓦的理论更具有系统性与针对性,她的专著《生生不息:妇女、生态与发展》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席瓦以妇女、自然与社会为基点,从妇女、科学与自然,自然中的女性,作为女性规则的森林,食物链中的女人,女性与水等角度钩沉女性与种种自然物质的社会关系,展开以女性为主体立场、自然为媒介客体的社会维度审视。她批判了工业发展与市场经济对自然的破坏,“随着森林、水和土地的破坏,我们正在失去生命支撑系统,这些破坏以‘发展’和‘进步’的名义产生,但是进步的概念一定有严重的错误,它威胁着生存本身”<sup>③</sup>。她认为这种冲突与矛盾无法解决。她批判了印度绿色革命的单向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权力垄断和侵蚀效应,指出跨国公司按照需求进行的生产干预,不仅破坏以妇女为核心的生态绿色发展与循环,更参与破坏了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公平正义。尤为重要的是,席瓦站在妇女立场,探讨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发展态势及其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席瓦较为深刻地批判了以科学和发展等为名的西方殖民模式,“因为西方文化贩卖的‘科学、发展、进步’等范畴,绝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只不过是现代西方父权制特有的工程”<sup>④</sup>。

此外,近些年生态女性主义的交叠趋势越来越明朗化。随着生态批评由“自然之物”向“性别、族裔与环境正义”延伸,在生态女性主义将“男权/父制”指认为生态危机之因后,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范达娜·席瓦等透过环境正义视角,探讨种族、阶层与文化对女性的破坏与异化,分析生态与性别政治的复杂关系。这种环境、性别与正义之间的理论角逐,基本上完美地绕过了性别本质主义的局限。恰如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所指出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跨文化语境中协商理念和价值时,力求规避性别本质论,她们都强调在思考性别问题时,将阶级、种族和性别取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sup>⑤</sup>事

①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36.

②参见纪秀明:《近十年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学术态势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8, p.xvi.

④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8, p.xvi.

⑤[美]格里塔·加德:《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探讨梅卡人捕鲸诉求中的伦理语境及内容》,韦清琦译,《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



实上,生态女性主义除了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一种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多文化杂糅理论。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种杂糅与交叠现象。交叠性是对范畴本身(如性别、种族)的模糊甚至解构,倡导多面性,并容纳各层面、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化及动态性。“‘交叠性’一词:与仅仅概括一个、两个或三个压迫性类别的影响不同,中间性概念的拥护者强调这些类别的交织性质,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加强或削弱。”<sup>①</sup>当前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较多热衷于依据种族、文化、精神传统对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进行关注,开展多层次、多维度、交叠的审视与批判。

## 二、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拓进

国内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与西方批评理论积极对接与融合,另一方面逐渐强化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反思与本土批判意识。这固然得益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西生态女性主义者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批评指向的趋同,但更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学者基于中西伦理、文化与政治的差异性,自觉开启了“跨文化、区域、国别”的本土辩证性思考。

### (一)对生态本质主义的理解与修正

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大范围借鉴了生态本质主义观点<sup>②</sup>,比如陈厚诚、王宁认同生态危机的女性文化关联,指出“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sup>③</sup>。龙娟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天然宿命,“因为女性在遭到奴役的时候,自然的魅力也就在‘祛魅’的进程中消退了”<sup>④</sup>。刘文良强调女性与自然的相通性:“女性与自然相通,女权运动与生态运动联手……如果我们能够从女性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和走出困境。”<sup>⑤</sup>

过分强调“女性”和“自然”的本质主义关联,容易忽略女性的多维性和自然的多样性,抹掉女性与女性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性,文化内部的纷繁差异经均质化而被抹平。国内学者很快也辨识到该理论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本质主义机械性有待修正。董山民批判了“自然/女性等式”的错误逻辑,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认为“以生态自我为核心的普鲁姆德的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实现了对隐喻思维和二元思维的超越”<sup>⑥</sup>。苗福光提出了类似于鲁枢元的基于“自然-精神-社会”三重维度的结构设想:“一是从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在男性主宰的文化系统中,男性如何压迫自然和女性;二是从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关照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和人类自身在面对重重生态危机之下精神产生异化的问题;三是从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的向度,对生态自然和妇女以及其他受男性压迫的一切生态群体进行考察,并挖掘出产生压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根基所在。”<sup>⑦</sup>在肯定女性与自然本质关联的合理性后,韦清琦也观察到女性与自然的辩证与双向助力的“交互性”,生态女性主义不再一味强调单向度的外部映射关系,“它使文学-女性、文学-自然这两种研究分别从自己的外部反身向内开出一扇窗户……在两者间建立的纽带关系成为双向互输能量的管道”<sup>⑧</sup>。曾繁仁基于整体美学观与存在主义美学观的理念,对本质论的片面机械性发起质疑,同时大力提倡整体有机论:“(将)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念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sup>⑨</sup>韦

① Winker & Degele, “Intersectionality as Multi-level Analysis: Dealing with Social Inequalit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1, 2011, p.43.

② 以2019年的相关论文为例,在中国知网以“生态女性批评”为关键词共检索相关论文51篇,持本质主义观点的在65%以上。

③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④ 龙娟:《环境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⑤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⑥ 董山民:《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女性等式”的张力剖析——兼论普鲁姆德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⑦ 苗福光:《欧美生态女权主义述评》,《学术论坛》2005年第10期。

⑧ 韦清琦:《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43页。

⑨ 曾繁仁:《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清琦在2020年又一次深化其整体性关联理论,强调“联系原则”,“旨在进一步破除二元论、强调联系原则的生态女性主义,应该更注重整体性视角,从而为自身获取更广阔、更有价值的批评实践空间”<sup>①</sup>。以上学者基本都坚持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理念,跳脱出“生态-女性”单一向度的关联隐喻,多元思考生态女性主义内涵、立体生态文化身份定位、文论层面的“生态隐喻”空间构建等复杂问题。由此可见,整体性、关联性逐渐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共识性修正,展示了我国学者的开放性批评气度。

## (二) 基于伦理、社会结构的差异思考

具有后现代思潮性质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演化形态、共振图景、发展走向等都有或隐或明的变化。加德认为,“(亚洲)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一些策略,用来发展跨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区域伦理问题和生态正义问题,以期避免虚假的二元论”;“(生态女性主义者)要牢记伦理关系的不同层次、历史和环境语境以及这些变量不断变化的方式”。<sup>②</sup> 这些伦理、社会结构的变量恰恰也是考察中西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差异性的重要切入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男性、感性/理性、自然/文化”等本质主义观升级到对“伦理与公正”问题的思考,是将女性自然观上升到伦理观与社会观的进步。受伦理意识与社会结构规约,源于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是推动生态女性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即使第一次生态女性运动的主题曾被聚焦于“军国主义”,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也未背离个性解放的初衷,其兴起与深化往往是从女性现实境遇出发、从个人解放愿望出发。基于差异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一长期以来的事实与传统,决定了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的妇女解放走的是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只是一种标志,一种反封建的手段,是‘五四’的人的解放的一部分”。<sup>③</sup> 中国女性在各个方面所获得和拥有的权利,都与社会解放同构。中国生态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对“自然-女性”父权强势文化的个体反抗,而更具有社会政治品格。

一方面,国内批评者更强调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文化属性,积极构建生态女性理论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叙事关联。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认为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三种趋势主要指向能源生态、公共基础主权、文化多样性:“未来生态女性主义和其他绿色群体必须共同致力于三个基本目标,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保护物种、性别和代际物质能源相互依赖性;保护新陈代谢价值和共同生活基础的主权;文化自治,保护‘差异’和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sup>④</sup> 我国的生态女性主义则更强调独特而具体的第三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比如章梅芳和刘兵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指向这一道路的概念工具,它倡导的正是关于经济、性别、环境和发展的新范式。这一新的范式倡导从东方的、第三世界的、底层人的、女性的、自然的立场和观点出发。”<sup>⑤</sup> “东方的”“第三世界的”与“本土性”赋予生态女性主义中国思考的独立性。这种本土视角已经超越了自然与女性的天然隐喻关联,看到了女性所“存在”环境的具体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差异性。王英伟和宋婷从生命共同体意识、维护和实现生态正义(确保区域、城乡等不同群体生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出发,强调女性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以推动我国政治层面生态文明建设。<sup>⑥</sup> 陈曦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绿色主义解释学,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念、学理和政策方面的启示。”<sup>⑦</sup> 岳婷婷“试图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佳方式”<sup>⑧</sup>,阐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妇女的地位与重要性,呼吁妇女介入保护环境活动,推动妇女问题和国家科学发展的共同进步。于娜强调了教育、宣传的赋权功能,以及我国女性

① 韦清琦、李家鑫:《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2期。

② [美] 格里塔·加德:《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探讨梅卡人捕鲸诉求中的伦理语境及其内容》,韦清琦译,《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

③ 陈雪:《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研究》,延安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11、9页。

④ [澳] 艾瑞尔·萨勒:《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邹庆治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⑤ 章梅芳、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与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8期。

⑥ 参见王英伟、宋婷:《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⑦ 陈曦:《生态女性主义学术旨趣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⑧ 岳婷婷:《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合肥工业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Ⅱ页。

全面发展与法治保障的制度完善问题。<sup>①</sup>

另一方面,基于“家国”传统社会心理结构与伦理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合状态,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让位于发展与生存的严峻性,女性个体的心灵体验往往让位于生存与伦理之思。我国批评界高度关注复合现代化形态下女性、生态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关系等深层次问题,有意识地挖掘与展示妇女与环境问题的本土关联。戴雪红等学者批判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脱离具体语境、抽象范式化的“环境正义”观,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抽象化、普遍化的‘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掩盖了生态运动中主体的多样性,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差异的利益主体”<sup>②</sup>,强调重新审视性别平等、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间的本土现实关联。章梅芳和刘兵“彻底反思和批判工业现代化的进步叙事,进而(提倡)开创一种具有包容性、文化多样性、供养性的生态经济”<sup>③</sup>。戴雪红批评指出:“20世纪后期的生态危机、贫困女性化、种族压迫加速是工业资本主义父权制所产生的难以避免的恶果。”<sup>④</sup>还有国内学者对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中的女性“物化”乃至商品异化进行了批判。鲁枢元批判货币价值体系的“非人格”“无色彩”“平面化”“齐一化”,批判货币对诗情的消解尚属于理论层面的辩证思考。<sup>⑤</sup>郑湘萍以他山之石重申我国理论警醒的必要性。<sup>⑥</sup>和亚茹从生态女性角度揭示了女性在自然困境、父权倾轧、商品化和资本消费等多重困境中的挣扎,提出解构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从父权社会中解放女性、构建文明生态的愿景。尤为可贵的是,她指出了作家面对商品经济与资源失衡时的叙事幻象与惨淡:“在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进程被迅速推进的今天,贾平凹站在宗法农村辩护人的立场上的这次文学实践,透露出某种惨淡经营的味道。”<sup>⑦</sup>她批评贾平凹以乡土自然风景观钝化女性苦难、以神性叙事淡化对苦难的关注,凸显了本土批评家的理论自觉。

### (三) 殊异的文化哲学观

怀特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最早批判了“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sup>⑧</sup>卡林·J.沃伦(Karen J. Warren)批判了父权文化框架,指出“西方世界对自己及其居民的基本信仰、价值观、态度和设想,是由压迫性的父权制概念框架所塑造的,其目的是解释、合理化和维持普遍的支配与屈从关系,尤其是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关系。这个概念框架最重要的特征是:①等级制的价值思考,即‘上一下’的思维方式,它把更高的价值、地位或威望赋予高居其‘上’者而不是屈居其‘下’者;②价值二元论,即在分离性的二者中,分离的双方被看作对抗性的、排他性的;这就把更高的价值赋予其中一方而不是另一方”<sup>⑨</sup>。事实上,这些代表性争议都没有跳脱出西方现代哲学的二元思维。怀特没有跳脱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的“统治/被统治”二元对峙;卢瑟尽管重新阐释了宗教,也不过是以主体的更替来解决“误读”,没有脱离二元思维;沃伦批判了父权制在等级、价值和统治逻辑三层面对女性/自然支配的合理性,其内在逻辑也是以二元对峙的方式实现的。无论是怀特被卢瑟质疑的宗教的根源预设性,还是卢瑟自身无法摆脱的二元对立局限,抑或沃伦的三层概念框架,都无法解释在现代技术与数字化拯救自然与身体的第一自然性局限后所出现的阶级、阶层与种族不公将归罪于谁这一悖论。这一系列的问题均表明西方二元对立哲学存在局限。

①参见于娜:《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浙江农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29—30页。

②戴雪红:《谁之环境?谁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与难题》,《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2期。

③章梅芳、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与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8期。

④戴雪红:《谁之环境?谁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与难题》,《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2期。

⑤参见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8页。

⑥参见郑湘萍:《范达娜·席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研究》,《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⑦和亚茹:《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一次亮相——评贾平凹〈极花〉》,《大众文艺》2019年第6期。

⑧[美]林恩·怀特:《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刘清江译,《比较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

⑨Karen J. Warren, *Ecological Feminism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转引自潘桂林:《相似与共鸣:女性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内在依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西方现代哲学主张天人相分、二元对立,将女人视为男人的对立面,已然不合理。尤其是生态本质主义将自然属性等同于阶级与种族的机械性演绎(比如传统西方文化以强弱二元思维处理种族与阶级问题),更存在悖论。但是,孤立强调女性的文化超越性也是片面而失之偏颇的,因为女性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无法剥离文化。因此我们在批判机械二元对立的同时,也在寻求能够解决理论内部矛盾的文化与哲学路径。事实上,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努力凸显本质主义属性,将女性与自然同一、男性与统治逻辑同一、情感与女性同一、理性与男性同一;另一方面,又提倡多样性,探索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理性/情感等二元对立的思路,比如用“包括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动摇由二元思维、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三点搭建的父权制堡垒,实现自然和女性的真正自由”<sup>①</sup>等。

正如胡志红所言:“就跨越性(跨文化、跨文明)延伸来看,由于文化模子的差异……要求依据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目标做出相应的调整。”<sup>②</sup>我们国内学者对生态女性批评也做出了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理论贡献。近些年随着西方文论中国本土化反思与文化重构意识的勃兴,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参与生态女性主义建构的理论趋势日盛。

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是哲学、宗教层面上的生态学。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这也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生态女性批评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传统文化哲学(尤其是道家思想)成为中国生态女性主义重要的本土思想来源。董山民指出:“西方有些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道家或者道教思想中找到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资源,并准备吸取道家智慧,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sup>③</sup>张琳探讨中国声音、中国传统“和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借鉴意义:“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展现中国独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和文学作品,并在中国独特的‘和’思想理论基础上构建现代和谐观。”<sup>④</sup>李建珊和赵媛媛强调:“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人与人的伦理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深化发展的重要环节。”<sup>⑤</sup>

尤为可贵的是,我国学者没有停留于对本土文化的自得,没有自足于道家思想等传统理论的外用,时刻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辨与警醒。一方面,有些学者基于中西文化差异性比较,在肯定各自理论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中西理论如何能够有效结合。何煦指出:“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批判和生态伦理意识上与老庄生态女性观的阴阳和谐、道生万物的理论有着相似点,但二者又在出发点、终极目标以及创新理念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如何将二者有效地结合应用,还是一个值得期待解决的问题。”<sup>⑥</sup>另一方面,我国学界时刻保持着本土化思辨与理论清醒。韦清琦、李家奎确认了西方学者把道家思想当作拯救西方生态危机的万灵药的事实,肯定了中国道家思想对丰富和构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作用;但同时辩证看待道家学说的适用性与真伪并存的问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道家思想在走向现代生态文化思想库的道路上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理论。”<sup>⑦</sup>他们指出,我们文化批评的最终目的是“在寻求古代智慧的生态意蕴时,要去伪存真,建立适于操作的现代话语体系”<sup>⑧</sup>。

#### (四) 实践路径的差异性

赵建建、盖光指出:“(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揭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妇女的统治的一致性,同时

①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求索》2004年第2期。

②胡志红:《生态女性主义:缘起、发展、反思及意义》,《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③董山民:《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女性等式”的张力剖析——兼论普鲁姆德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张琳:《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第1页。

⑤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2期。

⑥何煦:《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南京理工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页。

⑦韦清琦、李家奎:《生态女性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54页。

⑧韦清琦、李家奎:《生态女性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56页。

也致力于探讨二者获得解放的策略与途径,凸显自然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联性与复杂性。”<sup>①</sup>除了风起云涌的绿色环境运动外,目前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值得关注的策略主要有哪些呢?

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以田园实践构想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共建,弱化男性性别殖民与东方主义情结:“和男性一样,她们也梦想改造荒原。但是她们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和男性的伊甸园重现的论断不同,她们认为边疆是理想化的家庭生活的圣地,她们希望在这片花园中安置家园,建立熟悉的人类社群。”<sup>②</sup>女性的田园生态实践是感性与非功利性的。这种田园实践构想是对男权拓疆实践的微弱抗衡,但是当对男权的批判大范围崛起时,田园文化的女性主义反转一定意义上规避和淡化了生态实践的复杂性、社会严酷性与整体关联性。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批判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社会性别制度(父权制),而非资本主义和社会制度,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建立在父权文化基础之上的。她把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指认为“性政治”。同样,沃伦、麦茜特、普鲁姆德等也以抨击父权文化作为生态实践手段,认为对女性的剥削和对自然的践踏源自父权制文化及二元等级思维。很明显,田园实践或者父权文化批判实践的构想趋于窄化。而德奥波妮的“相互依赖模式”“平权的男女伙伴关系”以及墨菲的“对话性探讨”等虽颇具“关联性”与“整体性”理论倾向,但对自然/女性关系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及对作为人(包括女性)的实践能动性缺乏深入而辩证思考。此外,格里塔·加德提出建构“怪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将“受压迫的性别”拓展到遭受异性恋歧视(heterosexism)的所有“怪异”(queer)性现象。<sup>③</sup>本质上,这是一种以对文化多元与差异性的尊重为表象的后现代解构。而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墨菲等主张的从教育层面实现生态实践、实现生态教育的“涟漪效应”,又具有明显的随机性与非系统性。

我国学者也认识到生态女性主义实践路径的多元性。一方面,是以吴琳、郑湘萍、杨凤等为代表的启示型分析研究。吴琳评介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内涵,主要从文学角度考察理论与文学互动的实践方式。<sup>④</sup>郑湘萍、杨凤梳理与肯定了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活动的三个方面及价值,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参与人群和保护人群狭隘化、实践手段单调、缺乏与政府的深度沟通合作)。<sup>⑤</sup>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经验的丰富性。闫玉借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经验,具体探讨了我国低碳生活如何实现。<sup>⑥</sup>唐鹏鹏则是从本体论出发,研究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中国女性的环保实践,“通过对国内外经典女性环保实践和环保组织的分析,总结经验,探讨女性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与地位”<sup>⑦</sup>。

需要强调的是,近些年一批中国学者已开启生态女性主义与马克思实践论融合之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⑧</sup>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强调自然与人关系形成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历史实践性,认为实践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实践论一方面消弭了自然与女性之间文化隐喻的本质主义片面性,另一方面也将人与自然、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性别、阶级、种族、资本、技术等社会化审视维度。韦清琦关注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左翼理论发展,尤其注重挖掘性别、阶级、族群、宗教、年龄和精神等要素的交叠化,尝试印证生态女性主义在更宽泛意义上对压迫系统或统治

①赵建建、盖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②Annette Kolodny,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pp. Xii-Xiii.

③Greta Gaard, “Toward a Queer Ecofeminism,” in Rachel Stei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44.

④参见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参见郑湘萍、杨凤:《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成效及其困境》,《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⑥参见闫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实践低碳生活的启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⑦唐鹏鹏:《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女性环保实践研究》,兰州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第II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逻辑的批判,是一种更为“左翼进步的”“整体主义阅读方式”<sup>①</sup>。他参考麦茜特对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运动内部分支的归纳,从自然、人性、环境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和女性环境主义的形象四个方面,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女性批评的实践融合。<sup>②</sup> 郑湘萍通过比较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观上的和谐统一,认同二者对机械自然观的内在超越。从自然的社会性、自然的历史性、资本对自然与人的钳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然与人的双重解放等角度探讨马克思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意义。<sup>③</sup> 陈玲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分析自然资源分配与性别权利支配的根源不在于父权制,而在于社会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生态方式,并暗示社会革命才是最终的实践之路。<sup>④</sup> 相较于西方生态女性批评实践存在的窄化与解构性,马克思实践论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化视野。

###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叙事创作启示

虽然我国学者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二元论”“本质论”“现代进步论”等观点有很多独到的中国经验与见解,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极强入世性与实践性的文艺理论,就文学叙事实践而言,生态女性主义丰富了文学叙事与美学阐释的空间与路径,对我们有很多创作启示。

比如,隐喻与生态批评的互为表意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认同隐喻在生态批评中的重要作用。墨菲认为“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些方式……可以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sup>⑤</sup>,比如女人/自然、男权/父权的隐喻模式,往往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乐此不疲的表意手法。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也强调了生态、女性与文艺之间的隐喻关联:“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当自然遭逢劫掠时,女性也受到奴役,艺术也将走向衰微。”<sup>⑥</sup> 隐喻既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组成部分,也是生态女性主义实现表意的重要叙事手段。

再如,“典仪”“风景”等作为叙事手段的问题。“典仪”与“风景”在生态叙事中具有正负双向功能,其既是表现生态意蕴的正面手段,也存在文化保守、叙事不公的可能性。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文化的典仪与复古静默来作为叙事手段,可能会存在文化的非公平正义性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梭罗这样的先知也难免被批判,认为他隐逸的、男性主义的超自然情结是非革命化立场。此外,以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为例,尽管她挑战了男性神话,但其在风景叙事中也抹去了美洲土著人的存在,并有隐退回帝国主义的怀旧保守情结。这些都给予生态女性主义创作以丰富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总之,虽然理论界曾对“国内生态批评似有退场之势”表示过担忧,也有过对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畸形”或“残缺”的忧虑;<sup>⑦</sup>但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内涵的不断代谢,以及中国本土伦理、社会结构和文化哲学等差异性因素的合力,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空间与叙事审美空间必将日益开阔与丰富。

(责任编辑:陆晓芳)

① 韦清琦、李家鑫:《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年第2期。

② 参见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批评实践中的问题探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年第2期。

③ 参见郑湘萍:《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参见陈玲:《消除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革命之路——对生态女性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4期。

⑤ 华媛媛:《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⑥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⑦ 韦清琦:《知雄守雌——生态女性主义于跨文化语境里的再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